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七期 ——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1 c)

【史海钩沉】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揭开周恩来之谜

王若水
吴洪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 王若水 •

◇ 周恩来大力纠“左”

本文叙述 1972 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对一些青年读者来说，在回忆这一段历史之前，也许有必要把当时的政治背景交代一下。

1970 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 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1971 年 11 月 14 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 月 8 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

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9·13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71年底到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

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受杨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

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571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516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

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11月4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11月4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

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72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72年当年就有26号文件、31号文件、38号文件、42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月14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11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月24日，《文汇报》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导、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报》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导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

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

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啥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 周恩来的讲话

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

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迭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份。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

”。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了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份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份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

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青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输定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

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到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8月8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

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17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

◇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是（大两边+百）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

“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有君子作风，就想起刘是（大两边+百）。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是）；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1957年4月10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1973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是，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是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1957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是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是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太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结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恽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

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0年，刘是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4年，刘是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是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只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忠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1972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就不为毛泽东所喜欢了。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

□ 原载《人民日报回忆录》，作者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补充。

∞ ∞ ∞ ∞ ∞ ∞ ∞ ∞ ∞ ∞ ∞

揭开周恩来之谜

• 吴洪森 •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

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

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僻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入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

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

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

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

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图谋得逞，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

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乱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

他只有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

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

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

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

（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少奇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

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外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67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大了官，官瘾重，怕违背

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

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旦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

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像”了。然而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不充份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批判周恩来这样的伪“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 摘自香港《信报月刊》94年第9期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